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

李孝悌

——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

一、引言

民國十二年，以評論文章見長的甲寅派領袖章士釗對新文化運動加以抨擊，其著眼點主要是對白話文的風行痛下「針砭」。對章氏來說，白話文運動的迅速進展顯然到了讓人驚心的地步，所謂「今之賢豪長者，圖開文運，披沙揀金，百無所擇，而惟白話文學是揭。如飲狂泉，舉國若一，胥是道也。」^①而造成這種舉國若狂的現象的就是胡適。自從胡適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後，跟隨的人就「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②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吧咧之文變。」^③從章氏生動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人對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的看法，以及白話文風捲殘雲的態勢。連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胡適在這場「文變」中扮演的角色，擁護白話文運動的人就不必說了。廖仲愷甚至對胡適說：「我輩對於先生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

德，較孔孟大且十倍。」^③即使批判胡適不遺餘力的中共學界在這幾年的翻案風下，也開始比較客觀的全面重估其的思想，對他在白話文運動中的貢獻加以肯定。^④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白話文雖然因為胡適這位知音而由附庸蔚為大國，從此成為中國人抒情論理的主要工具，卻並不意味白話文運動一直到胡適的提倡才首開其端。）就和五四運動的其他許多面相一樣，我們必須在清末的歷史中找尋其端源。Benjamin Schwartz教授曾經用一個很巧妙的比喻說明這個觀點，他認為五四不是平原上突起的高峰，而是高山帶上比較高的山脈。^⑤這個比喻用來解釋白話文的發展同樣恰當。事實上，胡適之前早已有人提倡白話文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胡適本人就多次提到清末白話文的發展。^⑥問題是過去有關清末白話文的討論不僅低估或根本忽視了這個時期白話作品的數量，也不會對這項發展的意義作過適當的評斷。正因為我們對清末白話文運動的意義沒有確切的了解，我們對胡適在這個運動中的貢獻的真正性質，也勢必無法完全的掌握。本文的目的就在探討清末白話發展的詳情，分析其特質，然後再在這個歷史的脈絡下重新估量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中的地位與意義。

二、清末白話文的發展

李澤厚曾經用「啟蒙」與「救亡」兩個主題來解釋五四運動及其後中國思想史的發展。^⑦事實上，這兩個主題不僅可用來解釋五四，也同樣可以用來分析清末的許多發展。一八九五年，嚴復發表了著名的「原強」一文，利用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社會有機體」的理論，重新審視中

國的問題，提出了「鼓民力」、「新民德」、「開民智」的主張。⁸其中「開民智」的主張成為此後知識分子的新論域，「開民智」三個字也成為清末十年最流行的口頭禪，其普遍的程度絕不下於五四時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種為了救亡而強調啟蒙的重要性的思潮，在義和團之亂後達到最高潮，一般「有識之士」或所謂「志士」有感於「無知愚民」幾乎招致亡國的慘劇，紛紛設法從事各種開民智的工作。他們辦閱報社、宣講所；積極提倡演說；試驗、推展各種新的字母、簡字；為貧苦不識字的人辦半日、簡字學堂；發起戲曲改良運動。凡此種種，都清楚的指出在清末的十年，在救亡的強烈危機意識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一項空前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⁹就在這樣的思潮和運動下，清末的白話文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一) 清末的白話報刊

討論清末的白話文運動，第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白話報刊的蓬勃發展。根據一項統計，至少在一八九七年就已出現了兩份白話報，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一年共出了一一一種白話報。¹⁰而北京一地在辛亥革命後一年內就至少出了十六種白話報。¹¹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又出了二十七種。¹²事實上，這份統計資料還不完全，我就在一些報紙的記載和廣告中另外輯出二十份出版於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一間的白話報刊。¹³我想如果我們在各地的報紙資料中繼續梳爬，一定還可以發現更多在五四之前印行的白話報刊。

當然，這些報紙的壽命多半都不長，很多出了幾期後就因為經費不足而關門大吉。黃培林在一九〇八年八月十二日和八月十五日在北京分別出版醒群白話報和醒群畫報，但很快就停刊，¹⁴

可以說是相當典型的例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長年附刊白話的大報和一些有影響力的純白話報。日報中附設白話一門的以天津大公報首開其例，自一九〇二年創刊以後就經常性的附有白話論說一欄。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起每日定期出版白話附張，稱為「敵帚千金」，免費隨報分送，也另外單張出售。¹⁵不久之後，這些白話附張又以同樣的名字結集出版，到一九〇六年三月就已經出了十本。¹⁶到一九〇八年初出到三十冊。¹⁷這個時候，大公報認為風氣已開，北方的白話報紙日漸增多，不需要在「踵事增華」「每日曉曉陳言」，¹⁸所以停掉每天的白話附張，改為不定期的刊登白話專欄。剛開始時，有時七、八天甚至十幾天才出一次，但不久後，又恢復經常性的出版。

自從大公報附設官話一門後，「因為其說理平淺，最易開下等人之知識，故各報從而效之者日眾」。¹⁹這種為了開啟下層社會人民的智識而使用白話的作法，很顯然的已經成為一代風潮。以北方另一份主要的日報順天時報為例，也從一九〇五年的六月二十九日起出版白話附張，從七月十四日起開始經常性的見報，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都有白話論說或記事。在南方，一九〇〇年創刊的革命黨的第一份機關報中國日報也有白話專欄，更值得注意的是用白話或廣東方言寫各種戲曲，如粵謳、龍舟歌、南音、班本、雜曲等。這種刊載戲曲文詞的作法明顯的反映出清末改良戲曲以開通民智的思潮，只不過革命黨進一步用來宣傳革命。革命黨的另一個機關報民立報（創刊於一九一〇），也闢有雜錄部，每天刊載白話小說故事。民立報在清末的影響相當大，巔峰時期的銷售量高達兩萬份，²⁰毛澤東讀的第一份報紙就是民立報，讀後還激動不已。²¹

就純白話報而言，影響最大的首推京話日報。這份報紙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創刊於北京，一九

○六年九月因創辦人繫獄而被迫停刊。創辦人彭仲翼出身官宦世家，自己也作過小官，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期間，他一度衣食無著，「被迫流落在社會底層」，對下層社會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²²庚子以後，他開始辦報。首先在兒女親家梁濟的資助下，於一九〇二年出版了一份以童蒙為對象的啟蒙畫報，以白話配合圖片。根據梁漱溟的記載，梁濟之所以資助彭仲翼辦報，是因為「經拳匪之禍，公深痛國人之愚昧無知，決然以開民智為急」。²³這段典型的記述很明確的指出拳亂與清末開民智運動的關係。彭為了達到開民智的目的，在一九〇四年進一步辦京話日報。這份報紙出版後，大受歡迎，不僅流佈北方各省，而且東到奉黑，西及陝甘。「凡言維新愛國者莫不響應傳播，而都下商家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²⁴銷售量最高的時候達到一萬多份，成為北京第一個銷售量超過一萬份的報紙，也是當時北京銷路最大，影響最廣，聲譽最隆的報紙。²⁵大公報發行人英斂之對該報也讚譽有加，說「北京報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話日報為第一。」²⁶一九〇六年，該報因得罪當道停刊後，到一九一〇年為止，北京出的白話報至少有十幾種。這些報紙不論是在篇幅、格式或秩序上，全都模仿京話日報，「不敢稍有更張」，²⁷可以想見京話日報的魅力和影響力。

除了京話日報外，這裡還要特別提到安徽俗話報和競業旬報。安徽俗話報發行於一九〇四年，是半月刊，共出了二十二期，到一九〇五年停刊。²⁸這種維持一兩年就停刊的情形和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蘇州白話報、寧波白話報、紹興白話報等當時通行的白話小報差不多。²⁹對我們來說，這份報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主編是和胡適一起搞文學革命的陳獨秀。陳獨秀不僅是該報的主編，同時也是主要的撰稿人。³⁰一九〇四年八月第十一期中，陳以三愛的筆名發表「論戲曲」

一文，認為「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大教師」，³¹把戲曲、演員的地位推上史無前例的高峰；此外，他還在文章中提出戲曲的興革之道，是清末戲曲改良運動中的重要文獻。事實上，俗話報中絕大多數的論說都是陳以三愛的筆名發表，陳在五四時期的思想，有一部分在此已可窺見端倪，這點下文還要繼續討論。

競業旬報對我們之所以重要，則是因為胡適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文章。這份報紙於一九〇六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以後陸陸續續的發行，直到一九〇九年六月出到第四十一期為止。³²胡適在第一期就以「期自勝生」的筆名，發表了一篇通俗的「地理學」，這個時候他還不滿十五歲。後來胡適對這篇文章有所評述，認為「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³³從第二十四期開始，胡適負起旬報的編輯工作，一直到第三十八期。這個時期他寫了不少文章，有時候全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間，差不多都是他做的。³⁴他日後的一些思想主張，也同樣可以在這些文字中找到根源。這幾十年的競業旬報，照胡適自己的說法：「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³⁵這一年多的訓練對胡適、對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到底有什麼意義，在本文中會詳加分析，此處暫時不論。

上面曾經提到清末白話文和白話報，是在對下層社會進行啟蒙以救危亡的思潮下發展出來的，這裡打算對白話報理念和實際上的閱讀者作進一步的探討。在理念層次上，白話報的對象以下層社會為主體，是毫無疑問的。上舉大公報官話一門「最易開下等人之知識」是一顯例，順天

時報在一九〇五年添設白話欄，目的也在「開發下等社會」。³⁶參與編撰一九〇一年出版的杭州白話報，自號「白話道人」的林獬（又名少泉，後改名白水），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白話報。在發刊辭裡，他激切的說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麼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那十幾歲小孩子阿哥、姑娘們。」問題是這些希望所寄的人既沒有錢讀書，又看不懂「那種奇離古怪的文章，奇離古怪的字眼。」林和朋友商量之後，決定為了這些人辦白話報。³⁷一九〇五年在北京出版的工藝白話選報，也同樣立意為下流社會說法。³⁸此外，前述京話日報停刊之後，在北京出現的十幾種仿京話日報的白話報，根據記載，目的也在開通下等社會。³⁹又如廣東順德一個何某人，也在一九〇四年招集股本，打算辦一份粵聲報，用俗話戲曲來開發下流社會。⁴⁰而在一篇論說國語統一方法的文章中，一位作者提到當時的志士，「皆以中國文字太深，汲汲謀編輯白話書報以開通下流社會」，⁴¹可以看出當時的風向所趨。

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下流社會」或「下等社會」並不一定是識字的人，他們很可能是粗通文字的「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十幾歲的小孩子、姑娘們或林琴南說的「都下引車賣漿之徒」。⁴²一篇在一九〇二年發表，講述開民智之法的論說裡，就主張多設白話報館，「俾粗識字者皆得從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夢矣。」⁴³北京志士所辦的京津白話報，就是為了便利粗識文字的人。⁴⁴安徽俗話報在發刊辭裡對這一點說得更清楚：「現在各種日報旬報，雖然出得不少，卻都是深文奧意，滿紙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沒有多讀書的人，那裡能夠看得懂呢？……所以各省做好事的人，可憐他們同鄉不能夠多多識字讀書的，難以學點學問，通些時事，就做出俗話報，給他們的同鄉親戚朋友看看。」⁴⁵大公報在二千號的紀念徵文中，有一個題

目是「論推行強迫教育之法」其中一篇得獎之作就主張多設白話報社，將國家政治要聞，地方的疾苦利弊，工藝商業之發明以及社會學問的進步，編為白話列入報紙，以使粗識文字的人深知世界狀況，並增長其知識。⁴⁶

當時的人所謂的「下流社會」或「下等社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十分嚴格的界定，不過從上面舉的例子，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們包括那些人。基本上，這個階層的人當然包括絕大多數不識字的人，⁴⁷和那些粗通文字的人。而白話報所針對的下流社會，大體上指的還是粗通文字的人。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個階層的人數量相當可觀，亟待開發也比較容易用白話開發；一方面也是因為白話再容易，對不識字的人來說，還是起不了什麼作用。關於前者，近人的一項研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根據Rawski的估計，在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人粗通文字(Functional literacy或basic literacy)的，男性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女性則約當百分之二到十。⁴⁸至於後者，當時多數從事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對各種媒體的對象都有相當清楚的了解。他們對文字的局限深有所知，所以提倡戲曲；重視演說、宣講；試行字母、簡字；創設簡字學堂、字母報紙，針對的都是不識字的人。

至於白話對不識字者的作用，則主要是透過講報而來。例如一九〇五年，北京一個名叫卜廣海的醫師就把東四牌樓一帶一家說書用的茶樓，改為講報處，逐日講說京話日報。⁴⁹過不了幾天，就有人起而效尤，講的也是京話日報。⁵⁰一九〇〇年代，各大城市流行設立閱報處，以廣開民智。但當時就有人表示，閱報處對認得字而無餘款買報者有益，對不識字的人卻沒有功用，所以主張多設講報處，擇錄一些白話報，講給工藝人聽，再由這些人在喝茶閒聊時傳說給其他的人。⁵¹這

種由閱報社附設宣講所或講報處的情形在當時非常普遍，講的內容不一定只限於白話報，但白話報無疑的是重要的材料。根據報導，北京的進化閱報社每天晚上講報章時事，並配合自製的電影（應該是幻燈片之類的設施），痛論高麗和印度亡國的情形，聽者日以千百計。⁵²這個例子中，聽講的人數也許高於一般的宣講處所，但講報的作法卻是相當典型的。另外在天津河東一帶，一個叫做杜學義的窮教書匠在一所育英學館教書，為了訂閱報紙，不惜典當自己的衣物。因為有感於講報的好處，一天突然心血來潮，買了一個玻璃燈，在學館門外開起講報處來。講的主要就是白話報和敝帚千金等。剛開始，聽的人只有十幾個，都來自附近，不到十天，聽眾就增加到四、五十人，還有遠道的。杜氏照顧不來，特別找了四、五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幫忙。⁵³這個具體而微的故事，不但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當時開民智的風潮，怎麼樣影響到一般沒沒無聞的有志之士。也有助於說明白話報的閱讀對象和傳達到社會底層的方式。大公報一九〇五年一篇白話的論說，也提到中國在庚子以後漸漸開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〇五年上半年，京津一帶開了許多閱報處及講報者。⁵⁴這些講報者講的不一定都是白話報，但白話報包括在講材中應該是不用懷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寫作的白話，很多不僅是用來看的，也是用來說的，像「今日天氣不早了，改天再談吧！」「你們大家看看，我說這段白話是不是呢？」⁵⁵一類的表現法，很明顯的還有說書的意味在裡面。經常以竹園道人為筆名，在大公報上寫白話的丁國瑞（子良），在「竹園勸善白話並序」一文的標題下，就自加注解說「宜講與苦人及游手聽」。⁵⁶另外一個原因是宣講白話報在當時已經是許多人共同的想法。在一篇題為「論小說有益於社會」的文言論說中，作者歸結中國問題的解決，必自開民智始，而「欲開普通之民智，必自設宣講所，演白話報始。」⁵⁷有鑒於報紙

對人心的影響最快，北京的警部還特地在一九〇六年通飭各省設白話官報，並在各州縣的宣講所照官報演說。⁵⁸

白話報雖然多半以開發下流社會為宗旨，但有些報紙設定的讀者群，卻不侷限於下層社會，而涵蓋了各個階層。如一九〇二年在四川成都發行的啟蒙通俗報，就是要「為中下等人說法」。⁵⁹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官話北京時報，其對象包括士庶紳商。⁶⁰前述的安徽俗話報訴求的對象更廣，除了種田的、做手藝的、做生意的、當兵的和女人小孩以外，還包括了教書的和做官的。⁶¹

而各種白話報的實際閱讀對象也遍及各個層面。其中京話日報大概是最受一般民眾歡迎的報紙。前引梁漱溟的話，說「都下商家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⁶²證諸其他的記載，並不算太誇張。當時的報導就說京話日報在北京的勞動界頗為風動，「擔夫走卒居然有坐階石讀報者」。⁶³京話日報常常登載讀者的來稿，根據分析，這些投稿的人除了職員、蒙師、書辦、學生外，還包括了識字不多的小業主、小商販、小店員、手工業工人、家奴、差役、士兵、家庭婦女、優伶以及一部分墮落風塵的妓女。很顯然的，這份報紙和中下層社會的關係是相當密切。⁶⁴大公報的白話欄及敝帚千金，顯然也有很大的影響。不但其他的報紙紛紛仿行，還有人用為講本。前面提到的津門清醒居士在提到白話報的好處時，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說曾看到粗識字的人，專挑大公報的白話附件來讀，並且高聲朗誦，眉宇間露出得意之態。⁶⁵林癡辦的中國白話報雖然目的在開通下層社會，但根據他們自己做的廣告，購買的人多半是學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學生買報的目的是為了家鄉的「婦孺盲塞」，像湖南的學生就曾集資每月買幾百份報紙分給自己的鄉人。⁶⁶安徽俗話報開始的時候印一千份，半年後發行到第十二期

時，已增加到三千份，有時還要再版或三版，聲譽和杭州白話報相埒。它的讀者多半是當時所謂思想前進的學生，還有一些教師也以此作教本。績溪縣知事選出告示，鼓勵群眾閱讀，並且「捐廉購辦，隨同官報發行，聽人採取。」⁶⁷浙江湖州球溪的革命黨人蔡綠農辦了一家書店，叫做擺渡船，又名普渡書社，專購白話報及小說借人閱讀，對象則是各地的貧窮志士，⁶⁸這些志士也不一定是下等社會的人。

至於白話報的內容，則以破除迷信，勸戒鴉片，勸戒婦女纏足為主，還有一些勸惡懲善的道德文字和一些介紹新知的作品。以敝帚千金為例，第一本包含的作品分五大類：開智、闢邪、合群、勸戒纏足和寓言。⁶⁹雖然不少作品，特別是那些勸惡懲善的道德文字，在內容思想上和傳統的善書之類的刊物並沒有什麼差別，⁷⁰但形式的變化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到所載的道。多數的白話報固然是站在上對下的地位，對不識之無的愚夫愚婦施以教化，但也有像彭仲翼這樣深知民間疾苦，秉持正義的原則，站在人民的立場，對濫用權勢者痛加抨擊的作法。譬如對郡王府活埋侍妾的事件，除了零星的報導外，共寫了五篇有系統的論述。其他類似這種揭露官府黑暗面的報導也不少。⁷¹這種作風使京話日報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反既存秩序的激烈傾向。該報三番兩次的聲明：「我們這京話日報是一個膽大妄言，不知忌諱，毫無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國民的報」「凡衙門八旗的弊病，明說暗說，毫不容情」「應該爭論的，刀放在脖子上還是要說」。⁷²在傳統的政權下，這樣激烈的言辭是非常突出的。我認為這和採用白話有不小的關係，雖然採用白話不一定就表示和人民認同，但因為使用了一般人的語言而進一步站在他們的立場說話，在情理上是完全說得通的。

至於革命報刊如中國日報，其所登載的白話方言戲曲，則多半以時事作文章，對清朝政府或

保皇黨加以嘲笑、抨擊。譬如南音「裴景福拜月」就是根據廣東某縣知縣畏罪潛逃的時事加以改編，對裴的逢迎、貪腐、潛逃、就捕有非常生動、譏諷的描寫。⁷³班本「何化龍嘆監」，講的是廣西生員何化龍，原為康有為的弟子，後來熱心功名，改變志節，作駁革命軍一書，為清貴室賞識，寅緣直上，後來卻因招搖撞騙而繫獄。⁷⁴還有一些粵謳等歌謠則對武備學堂冷嘲熱諷。⁷⁵另外一篇用白話寫的「種界」，則明白了當的攻擊滿清，提倡種族主義。⁷⁶

就白話文的內容來分析，除了上述的激烈作風和言辭值得注意外，對本文的論旨來說，更值得重視的現象是，很多文章的對象非常明顯的並不侷限於下層社會的人，或者根本就不是針對「下等人」。我們可以把從一九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十六日陸續在大公報連載的「違警律白話釋義問答」，看成當時主政者或知識分子意欲將新的法律知識普及到一般社會大眾的苦心，但像「說政治」⁷⁷之類的文章卻很難說成是只為下等社會而發。像「勸學說」⁷⁸（勸一般私塾教師學新學）、「私塾改良說」⁷⁹、「講訓蒙當改用善政」針對的是教師及其他有能力改革的人；「敬告我直紳」⁸⁰、「勸士」⁸¹「對於懷柔高等小學生勸學白話」⁸²、「為福壽全事忠告京津商會諸公」⁸³都有明確的對象；「敬勸直省人民父老莫放棄了選舉權」⁸⁴、「天津縣城選民注意」⁸⁵固然可以看出當時推行憲政的努力，但有選舉權的卻都不是下層社會的人。又如「為什麼必得求外部出禁入公文」，目的在呼籲外務部速出公文，禁止英國輸入鴉片，以配合英國國內歸還中國禁煙主權的努力。⁸⁶「論順直國民禁煙會舉代表赴京」，標題下注明國民請注意、政界大老請注意、外務部諸公請更要注意。⁸⁷「勸立同志會」是希望大家組織起來，要求速開國會，這和「再忠告國會請願諸代表」⁸⁸同樣不是以一般人為主要訴求對象。而像「賣煙賣酒的應當有個締制辦法」⁸⁹雖然和

販夫走卒有關，但顯然是寫給官府看的。類似的例子還很多，這裡就不贅舉了。

(二) 其他類型的白話文

討論清末的白話文運動，除了白話報紙的蓬勃發展外，也不能忽視其他類型的白話。這些白話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各級政府的文告、宣傳，另外一部分則是私人寫的宣传或告誡性的文字，或是單張，或是以小冊子的形式。

講到當時的白話官方文告，第一個該提到的就是岑春煊。岑在一九〇三年做四川總督的時候，出了一份白話勸戒纏足的告示。⁹⁰此後很多人就以此為榜樣。岑的這張告示主要是為了響應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勸戒纏足的諭旨而發。根據當時人的看法，「諭旨者僅可及於上流社會，若下流社會則不能普及」，岑則是第一個將諭旨的意思寫為白話以為下流社會說法者；由於這份白話告示在公布以後流傳的非常廣，所以四川人停止纏足的也比其他省多。這位作者因此主張各官府應該仿效岑的作法。⁹¹另外一位作者也主張仿照岑出白話的例子，並且除了把告示貼在通衢大道外，還應該貼在茶社等人煙稠密的地方，以達到實際的效果。⁹²在一篇比較廣泛地討論開明智之道的文章裡，作者主張把小學教科書和官府對下等社會和中等社會的告示，全部改用白話。⁹³一個京官認為官府出的告示常常過於深奧，一般人不但不懂，反而經常誤解其義，所以上了一個條陳給某京堂，建議以後大小衙門的告示都用白話。⁹⁴

類似這樣的看法，可能對官府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以纏足為例，浙江宣平縣的縣令在一九〇三年出淺白韻示，告誡婦女。⁹⁵山東青州太守在一九〇四年出過半白話的告示。⁹⁶兩江總督周馥

在山東巡撫任內曾出過不纏足的淺說，移節江南後也如法炮製。⁹⁷順天府的房山縣令畢承緝在一九〇五年出了一份白話告示，勸戒纏足，他還特地命令把這些告示裱糊在木板上，懸掛在避雨的地方，以期長久保存。⁹⁸民政部也共襄盛舉，示諭一般民眾改良風俗。⁹⁹一九〇九年時作兩江總督的端方也出過六言的白話告示勸戒纏足，以為中下流社會說法，後來又進一步令江南自治局將天足說演成白話，刊印數萬張，發給各州縣自治會廣為演說。¹⁰⁰吉林省當道和川督趙爾巽則都為禁煙出過告示。¹⁰¹北京警局等衙門為了禁鴉片和煙照的問題，也採用同樣的辦法。¹⁰²

官府的告示內容相當廣，不限於禁煙和禁纏足。除了一般的內政，為了推廣新政或解決新政帶來的問題，各級政府都覺得有必要用白話周告眾知。一九〇四年，川督出了一張告示給「精強力壯」的男子和年輕婦女，要他們不要仰仗粥廠、煖廠等一類政府慈善機構的救濟，而應該自食其力。男子可以進勸工局，婦女可以進女工廠，以期學得一技之長。¹⁰³湖北常備軍的統領為文對所屬諄諄告誡，要他們遵守營規，不要私自外出，做出不法的勾當，他還命令各營的營官和哨官，要常常將這些懸掛在營門的規條唸給兵士聽。¹⁰⁴河北清苑縣縣令為了防止軍隊行軍操演時與一般民眾發生衝突，特地出告示曉諭百姓。¹⁰⁵興辦新式學堂是當時厲行的新政之一，為了達到招生的目的，天津的官立學堂出過這樣的告示：「眾位呀！現時又快到年底了，河北老鐵橋、東藥王廟兩等官小學堂，又招考學生了。眾位家裡子弟，有願意上學堂的，或八九歲，或十三四歲，念過幾年書的，全可以到我們學堂裡報名……。眾位呀！快來報名罷！快來報名罷！別太晚了才好呢！」¹⁰⁶內務府也將學堂的招生廣告寫成白話遍貼各處。¹⁰⁷吉林巡撫為了改良警政和私塾，特別寫了白話告示，分發各處張貼。¹⁰⁸河北密雲縣則凡是曉諭百姓的事，在正式的告示後都會附加演

說一段白話，所以「街上俗人」，都樂於傳述，有人曾經從店中的伙計處抄到勸種樹的白話一張，¹⁰⁹可以想見這類的白話大概傳佈得非常廣。另一個報導則說從古北口到密雲縣一百餘里的大道兩旁，栽滿了楊柳。¹¹⁰密雲縣的作法似乎收到不少成效。

巡警局由於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新政的推行，所以特別多的白話告示。從我們現在蒐集到的資料，天津和北平在這一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北京外城巡警局的告示還從一九〇六年起一律改成白話。¹¹¹（北京工巡局的告示則已在前一年一律改為白話¹¹²）內容則從禁止買賣春藥到失火時，巡警應如何應變，無所不包。¹¹³茲舉數例如下。一九〇五年十月，天津巡警總局公布了一張勸諭，大意是說這幾年在各種開民智的舉措後，天津的風氣已經改善了很多，但是燒冥紙的「陋俗」依然如故。這種習俗不僅本身沒有意義，還常常讓消防隊誤認為有火警而徒勞往返。因此為了改革陋俗和維護安全，希望民眾停止這種作法。¹¹⁴另外一個告示則表示河間一帶不久要實施新兵操演，並且請了各國官員前往觀閱，不料「愚民無知」，一傳十，十傳百，到最後居然傳出六國要跟中國開戰，不少人聽後恐慌而打算搬家逃離。巡警局為了安定人心，特出告示，並希望各地士紳四處演講，把實情告訴民眾。¹¹⁵天津在一九〇六年已經通行電車，對一般人來說，這還是相當新鮮的事，常常有大人小孩跟著車子跑，非常危險。巡警局為此不只一次的出白話文告，除了對上述的行為嚴加禁止外，還要求家裡的父兄對自己的孩子多多管教。同時對乘客也加以約束，禁止在車子停妥前跳車；又由於拉洋車的很容易和電車相撞，還對車夫作了一些限制。¹¹⁶北京的警部則對各地的警兵出告諭，要求他們改正違背警章的行為。¹¹⁷有時對一些芝麻蒜皮之類的小事，像各店鋪的門燈高低不齊，形式互異，他們也不放棄「明白曉諭」一番。¹¹⁸而

為了推行地方自治，並讓一般人對地方自治包括的一些日常行事有所了解，北京警局也四處張貼告示。¹¹⁹除此之外，由警局出的白話告示還包括：規定養狗的人家在晚上十二點以後要把狗關在家裡，以免成群嚷鬧，擾人清夢，也可以防止路人和巡警被咬傷¹²⁰；賣水和飲水的人都必需講求衛生，以防制惡疾；¹²¹禁止燒香、孟蘭盆會等迷信；¹²²禁止赤身裸體；¹²³要求民眾清掃街道，維護公共衛生以防止瘟疫¹²⁴以及如何防止火災、如何保持健康¹²⁵等。

由官廳發布的白話，也有很多不是以單張的告示形式出現。像一九〇三年，四川的警察局就刊印了一種教學用的白話課訣，共印行了五萬本之多。¹²⁶同一年，江西的警察總辦又因為警察兵的日漸腐敗，而刊行訓誡一本，編成白話，發給每個警兵。¹²⁷一九〇四年，四川鹽亭縣的一位縣令刊刻了一本淺白的廣蠶桑說，散發給鄉農，讓他們知道選擇改良的方法。¹²⁸直隸學務處則會公開徵求用淺白文字寫的教科書供小學堂的學生使用，¹²⁹這次徵求的結果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直隸學務處的作法卻絕非特例，御史杜彤就會經奏請學部，把中國歷史及各種時務演成通俗白話，頒發各省蒙小學堂作為教科書。¹³⁰也有大臣建議學部編纂立憲白話講義，令各地宣講。¹³¹學部本身為了推廣通俗教育，在一九〇八年頒布的宣講用書章程中，也鼓勵用白話和小說體裁的講本。¹³²此外，奉天將軍為了改善邊地的教育，開啟民智，也曾飭令學務處編撰白話講義，頒發各處，令地方官派員宣講。¹³³北京的練兵處為了增加兵士的知識，讓他們熟悉軍律，就打算把古今戰士效命疆場的事跡和各國的戰史，編成一本白話，名曰《行軍要義》，頒發給各營隊，每天演說給兵士聽。¹³⁴湖北提學司則令人將咸同光三朝政要編成白話通俗講本，給各地宣講所的講員作演說時的依據。¹³⁵京師勸學局為了推廣教育，特別編了一本勸諭父兄淺說，分送各學區廣為傳佈。¹³⁶北

京的巡警總廳則為了地方自治，在一九一〇年編了一份選舉淺說，挨戶分送給選民。¹³⁷這些例子的對象雖然有別，但用意、精神卻是一樣的。

私人寫的傳單、講本之類的白話作品，在內容上也包括得很廣，這裡只舉幾個代表性的例子。和官府的告示一樣，戒纏足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如上海的天足會為了讓一般人深切的了解纏足的弊害，特別製作圖說，在各處街道張貼。圖說上半部畫圖，下半部是白話，觀看的人有的把全篇撕去，有的撕上半截的圖畫，有的人則用鉛筆抄下半截的白話。¹³⁸天津一個叫劉孟揚的寒士組了一個公益天足社，並且寫了一篇勸戒纏足說，印成傳單分送；劉還提供別人送他的一些勸纏足的文字，包括上述岑春煊的示諭、張之洞的戒纏足會章程敘文、袁世凱的勸不纏足文小冊和一些不知作者的宣傳像救弊良言、去惡俗說、勸放足論、纏足兩說演義等，供人翻印。¹³⁹四川成都圖書局的傅樵村則作了一篇勸戒纏足俗歌，刊印分送。¹⁴⁰

一九〇五年美國禁止華工的條約公開後，在中國各地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地方都發起抵制美貨運動。北京各學堂的學生在六月初的時候就印製了傳單，列舉美貨的名單，勸人拒買。¹⁴¹保定有三個志士寫了一篇禁買美貨約，上面橫寫了「快看」兩個大字，貼在各胡同口，圍觀的人非常多，還有不識字的要求別人講說。一些天津和山東的愛國商人則寫了一篇「中國愛國的商民請看」，準備印一萬張送人。¹⁴²北京商會則把京話日報上抵制美禁華工的演說印了一萬份，分送給各商號。¹⁴³天津東門外則有一個人挨家挨戶的分送傳單，標題是「敬勸同胞不買美貨」，東馬路上也貼著這份傳單，引起一大堆人圍觀。¹⁴⁴廣東寧陽的幾位志士則公議把美約的要件印成白話，託輪渡的旅客四處散發。¹⁴⁵

此外，一些突發的事件，像一九〇七年的江北大水災，也會帶來白話宣傳的高潮。北京中國婦人會的英淑仲就為此印了幾萬張附有難民圖的啟示，到處散發。¹⁴⁵地方上的銀行、善會、志士也紛紛印發傳單勸募。¹⁴⁶而像國民捐的勸募，¹⁴⁸民立學堂、工廠的招生廣告，¹⁴⁹介紹地方自治，請求速開國會等憲政事宜，¹⁵⁰也透過白話引起了更大的注意。

三、重新看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運動史上的地位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白話文的發展，在清末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與社會運動。這當然不是說白話已經取得絕對的優勢，成為當時中國各地普遍使用的書寫工具。毫無疑問的，白話的使用基本上還是一些大城市裡比較風行。事實上，這跟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的趨向若合符節。最近Keith Schoppa對浙江的研究就指出明顯的區域性的差異。他根據人口、財政等幾個因素，把浙江分成內、外核心與邊陲等四個區域。內核心(inner core)區的現代化發展最見績效，其他以次遞減。¹⁵¹二十世紀初期之際，清政府鼓勵各地設立議會等各種自治機構，以及商會、農會、教育會等職業性的團體；這些團體就成為當時各項改革和新政的主要推動組織。¹⁵²而不論是這些團體的數目或是推行的新政，都是越核心的地區越多，也越見成果。核心區的領袖對變革有敏銳的感觸，致力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積極提倡教育、經濟方面的改革；邊陲地區則變革遲緩，傳統的勢力依然有著強大的影響。¹⁵³以現代式的新聞事業而言，到一九二〇年代中葉為止，就只存在於內核心區。¹⁵⁴

準此而論，白話文在大城市的特別風行，無寧是非常自然的。當然這也不是沒有例外。像以寫鴛鴦蝴蝶派小說著稱的包天笑，年輕時也在家鄉辦過蘇州白話報。報紙出刊後，他們並不向城市裡銷售，反而往鄉村城鎮進攻，並且特地派人到鄉間去貼招紙。這份每冊只有八頁的旬報，第一期共計售出七、八百份，都是由各鄉鎮的小航船帶去賣的，許多市鎮的小雜貨店也代為寄賣。

⑮而上文舉的一些告示等宣傳品，特別是各縣政府印行的，很有可能傳佈到鄉間。即使類似的例子不多見，也不會影響到本文的論旨。因為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過去我們對清末白話文的發展，多半都忽略掉了，更沒有人把這項發展放在清末開民智的思潮和運動中去估量其意義。事實上，即使我們僅從清末白話文在數量上的統計著眼（像上文中提到的白話報的數目、京話日報的銷售量、某些傳單印發的張數等），也足以讓我們思考它們在質量上可能造成的轉變和意義。進一步看，整個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在思想、文化和社會史上的重要性，在於它們為日後中國歷史發展上的一些重大動向（這些動向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是共產黨和非共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社會的層面走向人民的各種運動），開啟了具有實質意義的源頭。Schwartz教授認為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章炳麟、王國維那一代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突破的一代，可以說是有一個有洞燭力的論斷。⑯就白話文而言，我們也可以說清末最後十年的發展是中國近代白話運動史真正的開端。五四的白話文運動絕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異物，而是清末發展的延伸和強化。換句話說，清末的白話和五四的白話並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發展，而是同一個延續不曾斷絕的新的歷史動向的產物。

我們說五四白話和清末的白話屬於同一個不會斷絕的傳統，最直接的證據是領導一九一〇年

代白話文運動的兩個台柱——胡適和陳獨秀——都在一九〇〇年代的主要白話刊物上寫過大量的文字，而且其中的一些主張都成為一九一〇年代啟蒙運動中新思想的要素。像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中連載了好幾期的「惡俗篇」，就對傳統的婚姻制度大加抨擊。對陳來說傳統婚姻制度的最大問題是「不合情理」，他特別對女性在這種制度下所受到的迫害，大發不平之鳴。他還舉了安徽「等兒媳」的風俗來說明。在這個習俗下，沒有兒子的人家常常先娶了媳婦，等兒子出生。如果不幸這戶人家一直沒有子嗣，先娶過門的媳婦也要等到二十多歲才可以另外擇配。即使這戶人家有了兒子，也總是「十八歲大姐周歲郎」，「那媳婦也少不得守十幾年青春活寡，才能夠成親婚配」。「你道這是天地間何等不合情理的慘事哩！」¹⁵⁹陳獨秀這種質疑的口氣和態勢，已經頗有五四時期魯迅所謂「吃人的禮教」的味道。陳在討論了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婚姻習俗後，對男女平等之義再三闡述，並提出女性應該有自由離婚的權利，有不守節改嫁的權利。¹⁶⁰他還對女子為了取悅男人而妝扮自己的作法冷嘲熱諷，認為是像對囚犯的刑罰，女子的種種飾物就像是腳鐐、手銬、枷鎖一樣。他因此要婦女們反省：「受了許多苦處，裝扮得似蝴蝶兒一般，到底是要給他人看呢？還是自己看呢？」分析到最後，婦女努力裝扮自己的現象背後所透露的訊息不過是「混帳的男人，拏女子來當做玩弄的器具。」¹⁶¹這句話和胡適後來寫易卜生主義，大力推銷娜拉時，說娜拉的先生最大的錯處，「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¹⁶²幾乎如出一轍。陳獨秀要女人自省，不要作男人的囚犯；主張女人有離婚的權利，雖然不像後來娜拉為了對自己的責任，為人發展個人的自由意志而離家出走那麼的戲劇化，¹⁶³也沒有像胡適那樣全面而深入的點出個人主義的題旨，但在本質上已經強烈的顯現出五四的啟蒙精神。他對西洋婚姻的羨慕，¹⁶⁴在當時就已經得到迴響，在

他主編的安徽俗話報上不久就出現了主張婚姻自由的議論。¹⁶³雖然我們不知道寫這篇「再論婚姻」的真正作者是誰，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們前述的論斷：即清末的白話和五四的白話在本質和精神上有許多一脈相承之處，即使前者在論證或演繹上不及後者的周延、深入，在立場上也不及後者那麼激烈或極端，但發展的脈絡和痕跡卻歷歷可見。

這個發展的過程在胡適的夫子自道中看的格外清楚，上文中引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在競業旬報上寫的幾十篇文字，「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¹⁶⁴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這一年多的訓練不僅使白話從此成了他的一種工具，也不僅預示了他日後文章的風格，「長處和短處」，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地方是胡適日後思想的一些要素，在此已可以看出它們的活水源頭。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有一些思想後來成為我的重要出發點的，在那十七八歲的時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傾向了。」¹⁶⁵舉例來說，他從旬報的第三期起開始連載一部長篇小說，題目叫「真如島」，目的在「破除迷信，開通民智」。寫到第八回時，胡適借主角孫紹武之口，大談起因果問題來，說：「譬如窗外這一樹花兒，枝花朵朵都是一樣，何會有什麼好歹善惡的分別？不多一會，起了一陣狂風，把一樹花吹一個『花落花飛飛滿天』，那許多花朵，有的吹上簾櫳，落在錦茵之上；有的吹出牆外，落在糞溷之中。這落花的好歹不同，難道說這是這幾枝花的善惡報應不成？」¹⁶⁶這大概是范疇的「神滅論」第一次被人用這麼淺近的白話翻譯出來。用范疇的反駁因果關係的思想來宣揚無神的觀念，並攻擊宗教信仰中的種種迷信，在不到十七歲的胡適的思想中已經牢牢地生根，並成為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後來到美國留學期間，他又對神滅神不滅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並回憶自己這個見解的發展過程。他說在十二歲時讀通鑑，「見范

續此書，以為精闢無倫，遂持無鬼之論，以此為中堅。十七歲為競業旬報作無鬼語，亦首揭此則」。到了美國後，因為「稍讀書治科學」，才知道范縝在某些地方用類推法作比喻，在論理上有瑕疵。¹⁶⁷不過這並未影響到他對鬼神之說的立場，反而更足以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持久的關注。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發表的名著「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適又再度引用神滅論來說明他的觀點。¹⁶⁸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他五十五歲的時候，還是對范縝不能忘情，在英國康橋修正寫定了「考范縝發表『神滅論』在梁天監六年」一文。¹⁶⁹

胡適另外一個不要兒子的理論，也在五四時期反孔非孝的辯論中掀起過漫天波瀾，而這種思想的核心也同樣見於他此時的言論。在一九〇八年於上海發刊的安徽白話報的創刊號上，胡適寫了一篇「論繼承之不近人情」（這篇文章後來轉載在競業旬報第二十九期）。在文章中，他用激烈的口氣批評「把兄弟的兒子承繼做兒子」這件事，認為是一件「最傷天害理，最背倫理豈有此理的風俗」，「是一種剝奪人權的野蠻制度」。¹⁷⁰他並由此更進一步，不但反對承繼兒子，並且根本疑問為什麼一定要兒子。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提供了一套嶄新的看法：「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這番議論，後來因為留美期間讀了培根的論文，而得到進一步的發揮，成了胡適有名的「無後主義」。¹⁷¹據胡適日記的記載，他是看了培根的「婚娶與獨處論」及「父子論」而深有所感。培根在文章中說道：「天下最大事功為公眾而作者，必皆出於不婚或無子之人，其人雖不婚無後，然實已以社會為妻為子矣！」「吾人行見最偉大之事功皆出於無子之人耳。其人雖不能以形體傳後，然其心思精神則已傳矣！故唯無後者，乃最能傳後者也。」胡適原有的「以社會為兒子」的獨特見解，培根在這裡用更具煽動性

的言辭表達出來。胡適雖然對培根的人品頗有微辭，但對這番議論則大表佩服，不斷誇獎其魄力、見地，甚至說出「吾嘗疑吾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其最大原因，毋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言歟」之類的話。他因此提出「無後」之說，要人「知後之不足重，而無后之不足憂。」¹⁷¹上文提到的「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也是由此演變而來。¹⁷²此外像「我的兒子」等文章，基本上也是這個觀點的引申。¹⁷³

不但陳獨秀和胡適在五卅時的一些思想可以追溯到一九〇〇年代發表的白話作品中，胡適一些有關白話文學的獨到見解，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過。一九〇四年發表的一篇提倡白話報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文學進化」的觀點。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先表明「白話報者，文明普及之本也」，接下來就討論文學由文言到白話的演化。作者引用一個叫灑江保寫的羅馬文學史，認為中國文學的進化和羅馬文學的發展相同，都是韻文完備後有散文，史詩工善後有戲曲。宋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之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行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作者並認為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實在是白話報和歷史傳記的先導。這種一步一步的演變，正是「進化之公理」。¹⁷⁴這些看法和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的議論相比，已經可以說是規模粗具了。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有感於官話報既不普及，又不易了解，而提出了「國文」與「國語」統一的要求。¹⁷⁵這篇文章在這方面的論述雖然籠統、簡略，但說它已經有了一點「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意思，應不為過。

除了這些例子，前文中提到的許多白話報激烈抨擊當政者的作風和它們的啟蒙性格，以及許

多白話論述中強烈批評傳統習俗的文字，也已經和五四反宗教、反傳統、反權威與提倡啟蒙的幾個重要主旨前後輝映。

上面的論述，應該已經把五四和清末白話的傳承，延續關係闡釋得相當清楚。但這裡必需特別強調的是，說五四白話和清末白話有明晰可察的傳承、延續關係，卻並不表示這兩個時期的白話運動是相同的東西。我們如果把清末的白話比成樹苗，五四的白話文就應該是枝葉扶疏的大樹了。大樹雖由樹苗衍生出來，但卻不表示大樹和樹苗是一個東西。事實上，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和清末的白話發展確實有著重大的差異。胡適，正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曾經提到胡適對清末白話文的發展有相當的了解。但基本上，他認為這個時候的白話運動有兩個重大的缺點：一是「白話的採用，仍舊是無意的、隨意的，並不是有意的。」相形之下，民國六年的文學革命則是一種有意的主張。¹⁷⁶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對這種看法稍加修正，認為前此提倡白話文的人，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卻不會「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¹⁷⁷第二個缺點是清末提倡白話的人，還存有「我們」、「他們」的心理。¹⁷⁸「他們」應該用白話，我們則繼續做古文古詩。「我們不妨依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¹⁷⁹上等的士大夫明知白話文可以作「開通民智」的工具，可是自己卻瞧不起白話文，認為白話只能用於無知的百姓，而不可用於上流社會。他們依然「迷戀著古文字的殘骸」，繼續認漢字，唸八股，做古文，而另外作一些白話、字母、拼音文字給下等人使用。¹⁸⁰

胡適所指陳的這兩個缺點，大體上指出了清末白話文運動的特色或不足之處，這裡打算進一步加以引伸。如前所述，清末提倡白話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為了啟蒙救亡，對象則以下層社會為準。

也有一些人主張藉白話來開發「中下等社會」，但基本上，仍然以下等人為最大的訴求對象。這從當時白話文在風格上與傳統的說書或是善書、聖諭廣訓之類的文字有許多類同之處可以看出。¹⁰⁷不過另外一方面，前面已提到，這個時候也有不少文章有意無意的以上等社會或受過不少教育的人為對象，而它們實際的讀者中也有不少是思想前進的學生、老師一類的知識分子。¹⁰⁸很顯然的，某些白話報刊已經成為宣傳新思想、新知識的主要媒介。由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清末白話的過渡性質。這種過渡不僅顯現在它的內容、風格和表現手法上，也表現在讀者的身分上。胡適說這個時期的白話作者仍然存在著「我們」、「他們」的分別，固然大體不差，但我們也要注意到清末白話逐漸向「中等社會」乃至「上等社會」移動的現象，特別是對有新視野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更值得重視。

就第二點而言，胡適說清末在白話的使用上依舊是無意的、隨便的，而缺少「有意的主張」，可以說是大錯特錯。但他又說他們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而不會「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則是值得玩味的解釋。清末白話因為以下等人為主要對象，目的在為他們「說法」、「開智」，所以多半只是想怎麼樣用最簡單的表達方式把意思傳達清楚。為了牽就對象、為了達到他們最關懷的目的，這些文字往往「質勝於文」，流為說書或傳統勸戒文字的窠臼中。用這種未經刻意琢磨、修飾、精鍊的文字而想贏得講求詩章，長久接受文字訓練的傳統讀書人的青睞，在科學沒有廢除，傳統的秩序仍然沒有完全解體的年代，其困難是可以想像的。要他們為下等人寫一些俚俗的宣傳文字當然可以，但要他們「盡廢古書，改行用土語為文字。」¹⁰⁹卻是抵死難從。林琴南在清末的時候寫了不少白話文，¹¹⁰但對胡適等人的文學革命主張卻聲嘶力竭的痛加撻伐，可以說是最戲劇性地透

露出箇中癥結。

胡適提出的革命十字真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乍看之下，實在模糊難解，但如果放在這樣的脈絡下來看，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他的命意所在。清末的白話講求的只是把文字作為載道的工具，胡適卻知道只載道，而不對文字本身加以精鍊，是無法取得上層社會認同的。他在介紹歐洲的文藝復興時，特別提到各國國語復興的過程，本來在「中古之歐洲，各國皆有其土語，而無有文學」，一直等到但丁等人用義大利文創造了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後，本來是地方方言的義大利文才取代了拉丁文，成為通行的國語。其他各國的情形也類似。¹⁸⁶而在中國，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正是和但丁等人用土語、方言創造出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是建設白話成為新的中國語的過程中，必不可缺的寶藏。清末的白話用來載道固不成問題，要用來言志，表達複雜的人生感情，卻是力有未逮。這就是為什麼提倡白話文學的原因了。

白話必須加以鍛鍊，讓它足以用來創造文學作品，這樣白話才能夠成為眾人皆愛的文字（國語）這一層意思，胡適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寫給梅光迪的一首白話詩中已經可以窺見端倪。這首詩是這麼寫的：¹⁸⁷

今我苦口曉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鍊」……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而他在用白話寫小說、詞曲、演說的主張得到論敵梅光迪、任叔永的大致認可後，¹⁸⁰還緊追不捨，堅持要用白話作詩，以搶奪下白話文學這場戰爭中的最大壁壘，分析到最後，還是因為詩畢竟是文字最精純的結晶，是文學藝術的極致表現。詩這個用以言志的戰場可以攻下，白話文的成功才可以得到終極的保障。

所以胡適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最大貢獻，就在他把清末已經蓬勃發展的白話文重新定位，將它的對象從下等社會或中下等社會，擴及到每個層面；將它的使用者從「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昇到大學教授和文學、藝術殿堂的守衛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¹⁸¹清末仍然帶有泥土味的白話在胡適的往復辯難和大力提倡下，終於升堂入室，發展到一個新的境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在他晚年的自述中說，對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或「新思想運動」，他寧願用「文藝復興」這個名辭來指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雖然知道文藝復興的涵意甚廣，帶來了「新文學、新文藝、新科學、新宗教」，但他更重視的無寧是「文藝」這兩個字一般性和最明顯的意思：文學與藝術。他在提到「新潮社」的成員可能受到他的影響，而把整個五四運動叫做「文藝復興」之後，接著說：¹⁸²

更具體的說，他們都清晰地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新語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達的工具之需要，雖然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尚未涉及藝術，

而文學革命對這批成熟的北大學生來說，也已經是雙方極其相同之點的一環了。這實在是微頭徹尾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項對一千多年來所逐漸發展的白話故事、小說、戲劇、歌曲等等活文學之提倡和復興的有意識的認可。

這段晚年的自白，確切無疑地說明了胡適是如何看他所領導的五四白話文運動。^①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個成語用在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發展上，是再恰當不過了。如果沒有一九〇〇年代開始的白話文運動，如果不是因為在他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前十幾年，白話文已經有長足的發展，使一般人的心理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準備、了解，我們很難想像胡適的主張是否能一舉中的，並讓他「暴得大名」。更重要的，如果不是因為白話已經漸漸成為當時前進，有變革意願的知識分子採行的工具（雖然只是工具之一），白話的創品並為這些人所接受、所喜愛；如果不是有這股強烈的啟蒙風潮讓胡適、陳獨秀等未來的「文變」領袖在其中浸淫、成長；如果不是有那麼多的園地，可以讓他們來試煉這個工具，那麼不用說這個工具是不是會在不斷的試煉後漸趨鋒利，我們甚至根本懷疑胡適會不會生出用白話寫文章的念頭，更不用說「文學革命」了。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在清末這個特殊的環境、土壤中成長，並身與其役，我們懷疑胡適白話文學的念頭會有萌芽、茁壯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個性有一種「一視同仁」的激進傾向，那麼即使有廢除科舉，推翻帝制這些客觀因素的助力，^②我們也很難想像白話文運動會在五四時期取得那麼重大的成就。這個「一視同仁」的態度加上他「截斷眾流」的勇氣等因素，使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震撼，並為中國的學術思想研究建立了新的典範。^③同樣一個

「一視同仁」的態度，使他無視於當時學術界對今古文的激烈爭辯，把它們和一個字，一首歌同樣當成歷史的史料和國學研究的一部分，因而對「新史學」的出現，作了奠基鋪路的工作。¹⁹⁴也是這個「一視同仁」的態度，讓他把清末以來的白話文運動逼上了梁山。上等社會用的文字和下等社會用的文字的區別，因此而泯滅。同樣的，俗文學和廟堂文學的差異也是不該存在的。工具只有一種，就是白話。文學革命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白話建立為一切文學的唯一工具」。¹⁹⁵

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的聲名和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之所以能夠確立，除了他在西學和白話文學上的成就外，他在國故學、考據學等上層文化中的表現和引發的衝激，也同樣重要。文學革命的主張雖然讓胡適「暴得大名」，但如果他的成就只及於通俗文化層次的白話文，他的影響力將是相當有限的。¹⁹⁶這個透徹有力的分析，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事實上，這套雅俗，上下的觀念用來解釋胡適在白話運動中的貢獻，也同樣有效力。在他的努力下，白話再也不是判斷雅俗、上下的準繩。一些傳統的白話小說被奉為「文學正宗」，通俗文化被提升到和上層文化等的地位；¹⁹⁷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也於焉誕生。

註釋

①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收於《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良友，一九三五），頁一九八—一九九。

②同上，頁一九七。

- ③ 《胡適來往書信選》（武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七九），頁六四。
- ④ 例如朱德發寫的《五四文學初探》（山東，一九八二），就詳細的討論了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及其影響，並肯定了胡在這方面的革命性貢獻。頁一五八及一二六—一九二。
- ⑤ Benjamin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73) Introduction. p. 4.
- ⑥ 如《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以下簡稱小史），（台北，啟明，一九五八）頁七一—一五；《胡適文存》（以下簡稱文存），（台北，遠東，一九八三），第二集，頁二六四。
- ⑦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於《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一九八七），頁七一—四九。
- ⑧ 嚴復，「原強」，這個議論在「原強修訂稿」中有更進一步的發揮，二文俱收於王主編的《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頁一三一—一五及二七。斯賓塞及達爾文主義對嚴復的影響見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第三章，特別是頁五六—五九。
- ⑨ 筆者將另外為文討論這項運動，此處姑略而不論。
- ⑩ 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餘種白話報刊」，收於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期（北京，一九八七），頁四九三—五三八。
- ⑪ 黃遠庸，「北京之會黨與報館」，遠生遺著，上冊（台北，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一輯）。黃氏這篇文章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所列的報紙則是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立案者。頁二五四—二五五。
- ⑫ 同註⑩，頁五三九—五四四。

- ⑬ 這些報紙依年代排列分別是：童子世界白話報，江西俗話報，又名江西白話報或青年愛，每逢朔望出版；江西實業白話報，江西新新白話報。已上分見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八、十四，九、十五；十一、五；十一；十二。一九〇五年出的有北京智化寺內出的工藝白話選報，練兵處出的勸兵白話報，見大公報一九〇五、七、卅一；五、十八。一九〇六年出的有留日學生辦的鵬聲報以及在北京西觀寺印行的新聞報社，分見大公報一九〇六、三、廿一及順天時報。一九〇六、十、五(?)。一九〇七年出的有中國婦人會小雜誌，每月出兩次；海城白話演說報；山東曹州府總兵辦的白話報；官話北京時報以及保定的中州白話報，分見大公報一九〇七、三、八；五、五；十一、十二；十二、九以及順天時報一九〇七、二、廿三(?)。一九〇八年出的有吉林蒙文報；北京的醒群白話報；山西汾陽的白話報，見大公報一九〇八、六、六；八、九，十一、十九。一九一〇年則有天津晨鐘白話報；安徽安慶通俗日報；北京新報，白話簡報，見大公報一九一〇、三、廿三；十二、十六；十一、一。
- ⑭ 順天時報，一九〇八、八、十二；八、十五。
- ⑮ 大公報，一九〇五、八、二十。
- ⑯ 大公報，一九〇六、三、十四。
- ⑰ 大公報，一九〇八、二、七。
- ⑱ 同上。
- ⑲ 大公報，一九〇五、八、二十。
- ⑳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一九七六），頁二一三。
- ㉑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7), P.139-140。

- 22 京話日報原報未見，對該報比較詳細的介紹可以看方漢奇，「京話日報」，收於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 V，頁五七—六九。此處的敘述見方文，頁五七—五八。
- 23 梁煥鼎、梁煥鼎，桂林梁先生遺著（中華文史叢書之三七，台北華文），頁三七。
- 24 同上，頁四二。
- 25 方漢奇，前引文，頁六八、五七。
- 26 大公報，一九〇七、十一、廿六。
- 27 大公報，一九〇七、十一、廿七；一九一〇、十、十二。
- 28 見安徽俗話報影印者說明，影印者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
- 29 沈寂，「安徽俗話報」，收於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II（北京社會科學院，一九八二），頁一六七。
- 30 同上，頁一六三—一六四。
- 31 安徽俗話報，第十一期（一九〇四、八），頁一—二。
- 32 耿雲志，「競業旬報」，見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III（北京社科院，一九八三），頁二七二。
- 33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一九五四），頁六二。
- 34 同上，頁六三。
- 35 同上，頁六七、六八。
- 36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四。
- 37 原報未見，此處引文俱見蔡樂蘇，「中國白話報」，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I（北京社科院，一九八二），頁四四二—四四三。

- 38 大公報，一九〇五、七、卅一。
- 39 大公報，一九一〇、十、十二。
- 40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八、廿一。
- 41 大公報，一九〇四、十、三十。
- 42 林紓，「致蔡鶴卿太史書」，收於畏廬三集，（台北，文海，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九三九—二），頁六七二。
- 43 津門清醒居士，「開民智法」，大公報，一九〇二、七、廿一。
- 44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七。
- 45 安徽俗話報，第一期，頁一—二。
- 46 仲玉，「強迫教育先從天津試辦之方法」，大公報，一九〇八、二、十。
- 47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識字與否並不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唯一因素，譬如官宦之家的婦女就可能不識字。David Johnson認為個人在社會的統治力的位階(the hierarchy of dominance)（例如有人有優越的地位，有人自給自足，有人則必需仰人鼻息），是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收於David Johnson等人編的*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五五—五七。
- 48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22-23, 82。
- 49 大公報，一九〇五、五、十五。

- 50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二。
- 51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六。
- 52 大公報，一九〇六、五、四。
- 53 大公報，一九〇五、七、十三。
- 54 大公報，一九〇五、七、廿二。
- 55 分見大公報一九〇八、九、一及十一、廿一的白話論說。
- 56 大公報，一九〇四、七、一。
- 57 大公報，一九〇五、十二、三十。
- 58 大公報，一九〇六、四、十五。我會另外為文討論閱報社和宣講、講報的情形，此處茲不贅述。
- 59 大公報，一九〇三、五、九。
- 60 大公報，一九〇七、十二、九。
- 61 安徽俗話報，第一期，頁三—四。
- 62 同註24。
- 63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十一、十七。
- 64 方漢奇，前引文，頁六七。
- 65 大公報，一九〇二、七、廿一。
- 66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四、廿二。
- 67 沈寂，前引文，頁一六六。

- 68 警鐘日報，一九〇四、一〇、廿二。
- 69 大公報，一九〇四、四、廿七。
- 70 包天笑就提到，和他一同辦蘇州白話報的表兄尤子青，本來就打算把報紙像善書一樣的免費送人。銅影樓回憶，頁一六九。有這樣想法的人也許不是少數。
- 71 參見方漢奇，前引文，頁六三—六五。
- 72 引見同前，頁六三。
- 73 中國日報，一九〇四、四、四；四、五，對裴景福一案的報導則見四、十八、十九、二十。
- 74 中國日報，一九〇四、四、廿三。何化龍事件的實際報導，則見該報四、廿一。
- 75 如雜曲「武備學生謠」，粵謳「一百零五日」、「笑」，分見中國日報，一九〇四、四、一；四、五；四、八。
- 76 中國日報，一九〇四、四、十二—十五。
- 77 大公報，一九〇九、三、十二。
- 78 同上，一九〇八、四、六。
- 79 同上，一九〇八、四、廿六。
- 80 同上，一九〇八、七、六。
- 81 同上，一九〇九、二、八。
- 82 同上，一九〇八、十二、二。本文是直隸視學陳恩榮所寫，顯然是對懷柔一地學生的演說稿。
- 83 同上，一九〇八、五、十九。

- 84 同上，一九〇八、十二、九。
- 85 同上，一九一一、四、廿一。
- 86 同上，一九一一、四、十及十一。
- 87 同上，一九一一、三、廿三。
- 88 同上，一九一〇、七、四。
- 89 同上，一九一〇、九、十九。
- 90 大公報，一九〇三、四、二—五。
- 91 大公報，一九〇三、七、廿九。
- 92 大公報，一九〇三、十二、一。
- 93 「開通民智的三要策」，大公報，一九〇四、三、廿六、廿七和廿八。
- 94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十一。
- 95 大公報，一九〇三、七、廿四。
- 96 大公報，一九〇四、十一、十八。
- 97 大公報，一九〇五、一、十六及三、十七。
- 98 大公報，一九〇五、六、十二及十三。
- 99 順天時報，一九〇七、三、十九??
- 100 大公報，一九〇九、一、九；三、四；六、六。
- 101 大公報，一九〇九、三、三十；一九〇八、四、三十；順天時報，一九〇九、一、廿七。

- 102 大公報，一九〇七、一、七；一九〇八、十、七。
- 103 同上，一九〇四、四、八。
- 104 同上，一九〇四、四、九。
- 105 同上，一九〇五、八、十五。
- 106 同上，一九〇六、一、七。
- 107 同上，一九〇七、三、二。
- 108 同上，一九〇八、六、十六和廿六。
- 109 同上，一九〇四、五、十二。
- 110 同上，一九〇四、五、十三。
- 111 同上，一九〇六、二、三。
- 112 同上，一九〇五、十二、十六。
- 113 順天時報，一九〇五、九、廿七??；大公報，一九〇五、五、十三。
- 114 大公報，一九〇五、一〇、十一。
- 115 同上，一九〇五、一〇、十六。
- 116 同上，一九〇六、二、廿一；十、十五。
- 117 同上，一九〇六、四、十五。
- 118 同上，一九〇六、八、五。
- 119 同上，一九〇七、四、廿二。

- 120 同上，一九〇七、五、廿九。
- 121 同上，一九〇七、六、六。
- 122 同上，一九〇八、五、十二及八、十；一九〇七、八、十九；一九〇九、二、一。
- 123 同上，一九〇七、七、二十。
- 124 同上，一九〇五、九、六。
- 125 同上，一九〇八、六、九；八、十二。
- 126 同上，一九〇三、五、四。
- 127 同上，一九〇三、十一、廿四。
- 128 同上，一九〇四、十一、九。
- 129 同上，一九〇五、四、三十。
- 130 同上，一九〇六、三、廿六。
- 131 同上，一九〇六、九、十一。
- 132 同上，一九〇八、三、十二。
- 133 同上，一九〇五、十二、十。
- 134 同上，一九〇六、三、十五。
- 135 同上，一九〇八、十二、十七。
- 136 同上，一九〇九、十、廿三。
- 137 同上，一九一〇、六、廿二。

- 138 同上，一九〇三、五、十。
- 139 同上，一九〇四、一、五；一九〇五、五、卅一。
- 140 同上，一九〇四、五、廿八。
- 141 同上，一九〇五、六、七。
- 142 同上，一九〇五、六、十一。
- 143 同上，一九〇五、六、十九。
- 144 同上，一九〇五、六、廿一。
- 145 同上，一九〇五、七、九。
- 146 同上，一九〇七、三、廿三。
- 147 同上，一九〇七、二、八；二、二十；二、廿三。
- 148 同上，一九〇五、十一、廿二。
- 149 同上，一九〇六、一、三；一、三十。
- 150 同上，一九一〇、二、三；五、十六；十、二；十一、十五；十二、廿九。
- 151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7-22。
- 152 同上，頁六一—七。
- 153 同上，如頁一〇〇；一〇三；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一二二；一二六—一三〇。
- 154 同上，頁七一。

- 155 包天笑，*劍影樓回憶錄*（台北，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四八—一，頁一六九。
- 156 同註 5。
- 157 安徽俗話報，第三期，頁一—四，引文見三—四。
- 158 同上，第六期，頁一—四。
- 159 同上，第十二期，頁一—四。
- 160 「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第一集，頁六四四。
- 161 同上，頁六四三—六四四。
- 162 同註 157。
- 163 雪聰，「再論婚姻」安徽俗話報，第十六期，頁一。
- 164 同註 35。
- 165 四十自述，頁六六。
- 166 四十自述，頁六三—六四。
- 167 胡適留學日記，二，（以下簡稱日記），（台北，商務，一九八〇版），頁三六〇—三六一。
- 168 見胡適文存，第一集，頁六九三—七〇二。
- 169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台北，一九八四），頁一九〇二—一九〇六。
- 170 這段引文轉引自陳匡時，「安徽白話報」，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 III，頁四九九。
- 171 四十自述，頁六六—六七。
- 172 同上，三年九月，頁三九二—三九三。

- 173 四十自述，頁六七。
- 174 文存(一)，頁六八七—六九二。
- 175 「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係」，警鐘日報，一九〇四、四、廿五。
- 176 「祝京津各日報」，大公報，一九一〇、五、九。
- 177 文存(二)，頁一八三。
- 178 文存(二)，頁二四六。
- 179 小史，頁一五。
- 180 文存(二)，頁二四六。
- 181 小史，頁一六—一七。
- 182 有關明末善書的流行和明中葉以後白話的各種太祖「聖諭六言」的解釋及清代白話聖諭的各種版本流通情形，見酒井中夫，中國善書的研究（東京：一九七三）頁四五—五七。
- 183 這些思想前進的知識分子喜歡讀白話報刊，當然和這些報刊的「開明」、「進步」作風有關。有一個報導說一九〇四年某處會試，出了一道美禁華工的題目，某號中全號的舉子都不知出處。刚好在考試前，有人分送紹興白話報而其中剛好有此事的報導，一個應試者於是將自己攜帶的那份報紙拿出來供全號的人索觀。這個有趣的插曲就很典型的說明了白話報的進步性。見警鐘日報，一九〇四、五、十八。
- 184 林紓，「致蔡鶴卿太史書」，收於林的畏廬三集，頁六七二。
- 185 見包天笑，前引書，頁一六八。
- 186 日記(四)，頁一一五二—一一五五。

187 同上，頁九七三。

188 小史，頁六〇—六一。

189 文存(二)，頁二四六。

190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一九八三)頁一七四—一七五。

191 胡適在留美時期，對文藝復興的看法則不太相同，認為「文藝復興」幾個字並不足以道盡歐洲十五、十六世紀歷史的精神和發展。因此他主張用「再生時代」來代替，見日記(四)，頁一一五一。Griener教授對這個「再生」的意義特別強調，並對五四時期「再生」一辭的意涵有相當精闢的分析。他還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這兩個辭彙在中國和歐洲所代表的意義的「異同」有詳備的討論，見Jerome B. Grien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314-319。

192 胡適對這幾個原因和文學革命成功的關係，有所分析，見小史，頁一九—二〇。

193 詳細的討論見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一九八四)，頁七七—九一。

194 參見拙著，「胡適與整理國故——兼論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食貨月刊，卷一五，期五—六，(一九八五)，頁六九—七〇。

195 小史，頁一二。

19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頁二九—四二。

197 同上，頁三〇。